

世界之鏡中的 日本文化

●王崧興

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46.

Ezra F.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79).

土居健郎：《「甘之」の構造》東京：弘文堂，1971。

中根千枝：《タテ社會の人間關係》東京：講談社，1967。

角田忠信：《右腦と左腦——その機能と文化の異質性》東京：小學館，1981

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觀序說〉《中央公論》，1964年10月號。

自從1853年畢利(Commodore Perry)率領的美國艦隊敲開當時閉關鎖國的日本大門，至今已有一個半世紀了。然而，日本人的鎖國心態仍然盤踞在他們的潛意識裏。最近因經濟摩擦而舉行的美、日經濟結構障礙的一系列談判，有些人形容為另一次的「黑船」事件。很明顯

美國談判的目的是想要改變在日本國內行之有年的傳統商業交易習慣與制度，進而徹底地打開日本有形與無形的門戶。看來，經濟貿易摩擦歸根結底應是個文化問題。

《菊花與劍》

戰後日本文化思想界所受的衝擊，應以潘乃德(Ruth Benedict)《菊花與劍》一書帶來的為最大。該書原著於1946年出版，日文翻譯本於1948年刊印後，即成為長期暢銷書，至今已出了七、八十版。潘氏是文化相對主義的倡導人之一，該書的內容自然也很強調日本傳統文化自成一「獨立體系」的事實。既然自成一獨立體系，維繫這個體系的天皇制是不可動搖的。有很多日本人至今仍然相信《菊花與劍》這一部書與戰後美國佔領日本採取維護天皇制的決策有很大關連。

戰後那一段思想混亂、日本人幾乎喪失了自信心的時候，潘乃德

的研究無疑地令日本的知識界五體投地，佩服她在沒有接觸到日本本土社會的情況下而能有如此深入的分析。她指出的若干日本社會特質之中，有兩項長久以來一直受日本人關注與議論，一是日本人的羣體主義，另一是日本人的恥感文化。顯然這是跟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和罪感文化相對比而言的。

在瀰漫戰敗氣氛的當時，日本知識分子對潘乃德列舉的這兩項日本文化的特徵，當然抱着完全否定的評價。他們認為羣體主義「各守本位」的思想，以及「誠實」、「自重」、「知恥」、「忍」的道德觀念，是一種非近代性與反民主主義的價值觀念，也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文化殘餘。可以想像到在戰後那一段時期，任何日本的文化特徵都很有可能被認定為日本近代化的負面因素、一無是處，去之而後快。這個時期可以說是對日本文化特徵的否定時代。

《文明生態史觀》

進入50年代中期之後，戰後的混亂時期告一段落，經濟開始復甦，日本人的精神也慢慢地安定下來。隨之而來的是對日本文化的重新評價，從完全否定的態度轉到歷史相對性的認識。其中較著名的是梅棹忠夫《文明生態史觀》（1957）的日本文化論。

梅棹認為，把世界分為東洋與西洋是毫無意義的，尤其是從近代化的發展程度來看更是荒唐。日本

到今日高度文明社會，絕不是因模仿西歐近代文明。根據他的「生態史觀」的觀點，日本的近代化是日本文明史的必然結果，走的是自己的獨自路線。

依照梅棹的說法，世界可分為第一地域和第二地域。舊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在歷史上曾由數個強大的帝國統治過，包括中國、東南亞、印度、俄羅斯、伊斯蘭各國，以及東歐，這片廣大地區是屬第二地域。而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僅有一小部分，其中東端的部分顯得更小，屬第一地域。即西歐各國和日本是屬第一地域。而其餘的國家則屬第二地域。第一地域具有共同的特徵，廣大第二地域之間亦有其相似的特點。

最顯著的對照是，第一地域毫無疑問都具有高度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在此，資產階級實際上也掌握了該社會的統治權。而資產階級事實上在近代革命之前早已形成，即這些國家在近代革命以前是封建制，而封建制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溫床。相反，第二地域的共同特徵是資本主義體制尚未成熟，而近代革命發生後在此一地域形成的大都是獨裁體制。革命前的體制不是君主專制就是殖民地體制，並沒有屬於封建制的，因而這些國家產生不了資產階級。

詳細論點在此不擬一一加以介紹。至少讀者可以從以上內容體會到，在50年代後半期日本經濟起飛的當時，梅棹的「日本文明論」無疑是對現實的一種肯定，強調日本的近代文明並不必依賴模仿西歐也能夠出現。日本的近代化走的是自己

的路線，跟西歐各國相互平行而發展。這種論調至今在京都學派還相當盛行。他們認為近代日本文明實源自其自己的歷史本身，有其獨特性的一面，絕不是中華文明、西洋文明或任何文明的亞流。

更多的「日本文化論」

進入60年代中期之後，有更多的「日本文化論」陸續問世。其中以中根千枝的《縱(tate)社會的人際關係》和土居健郎的《依賴(amae)的結構》這兩本書最受大眾喜愛，至今還一再重版發行。前者事實上探討了日本人「羣體主義」的人際關係，而後者則分析了表現於「恥感文化」的日本人精神與心理層次的結構。這雙層層次的特徵在潘乃德的《菊花與劍》一書早已被指出，只是當時的日本知識界強調的是它們的負面作用，根本採取否定的看法論述。

然而，隨着日本的經濟進入高度成長期以後，即70年代開始邁向經濟大國的同時，這些日本文化特徵幾乎都變成肯定的，且具有正面的價值。尤其是在企業界喧囂一時的所謂「日本式管理制度」就被認為建立在這種社會文化基礎上。此時，日本人自己也很樂意承認自己的獨特性。日本四島就等於是日本民族，又等於日本語、日本文化、日本社會。日本民族是單一民族，甚至連日本人的腦組織也跟別的民族的人不同，有其獨特性。

1975年在京都舉行的「腦功能與文化的異質性」研討會上，一位

耳鼻喉科醫生角田忠信做了一場引人注意的報告。他從失語症（因腦受傷而引起的）的研究指出日本人的腦組織是有異於其他民族的，即日本人的腦組織是左腦優位性，而西歐人則是右腦優位性。角田進而把此一特徵歸因於日本語言的特點——即元音的優位。腦組織受此一語言聽覺的影響而形成於九歲之前。論點儘管如此，但一般大眾只興趣於前半的論證，即日本人的腦組織是有異於其他民族的。從腦組織來說，日本人永遠是日本人，將無法變成西洋人。根本忽略了角田本來的另一重要論點：即腦組織在生理學上並無人種之差異，而功能上的差異是因後天性的語言環境所造成的。

強調並且肯定日本文化的獨特性幾乎成了70年代日本文化論的主流，而以1979年傅高義（Ezra Vogel）出版的《日本第一》一書達到最高峯。作者的原意是想激勵美國人向日本人學習，以防日本後來居上。但該書出版時適逢此一潮流，當然廣受日本讀者歡迎，同時也加強了日本人肯定其獨特性的信心。這一點可能連作者本人也始料不及。

國粹心態及其國際回應

當時的政界領袖也大力提倡日本文化肯定論。大平總理政策研究會報告書（1979）就有一段關於「日本文化特質」的記述：「歐美國文化具有諸如神與惡魔，勝與負，白與黑等兩者嚴峻對比的結構，而日

本文化如同划拳，沒有絕對的勝者，也沒有絕對的敗者。它所具有的特質是三者畏縮在一起的三極鼎立，圓環結構……與其說是遵守規則取勝的 fair play（原文片假名，以下同），不如說是各得其所的 fair share 的原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更是喜歡高談日本文化的認同。舉例來說，1985年7月27日在自由民主黨輕井澤研究會上，他說：「何謂國家？以日本的情形來說，並不是一個契約國家，而是自然共同體發生的。因此，不管是戰勝或戰敗，國家就是國家……在邁向國際國家的同時，（實有必要釐清）何謂日本文化？日本到底是甚麼樣的國家？跟美國、英國、法國、蘇聯有何不同？」換言之，中曾根高唱「國際化」的同時，也並不忘其「國粹化」。

然而，80年代中葉當日本人還陶醉於其文化獨特性的時候，國際上的輿論已開始對其特殊性不再容忍了。此時的日本已儼然成爲一個經濟大國，其貿易收支累積下來龐大外匯存底，同時又是續美國之後冒升爲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因而招致其他國家對其經濟政策的譴責，認爲日本是攪亂世界經濟秩序的元兇。起先大家只關心日本企業的動態和政府的經濟政策，但到後來則發覺這些外表上的動態和政策，是有其深一層的根源——即日本文化社會的獨特性。

在評論「日本問題」的論著中，以1986年荷蘭人記者 Karel G. van Wolferen 在 *Foreign Affairs* 雜誌上發表的《日本問題》〈The Japan Problem〉一文影響最大。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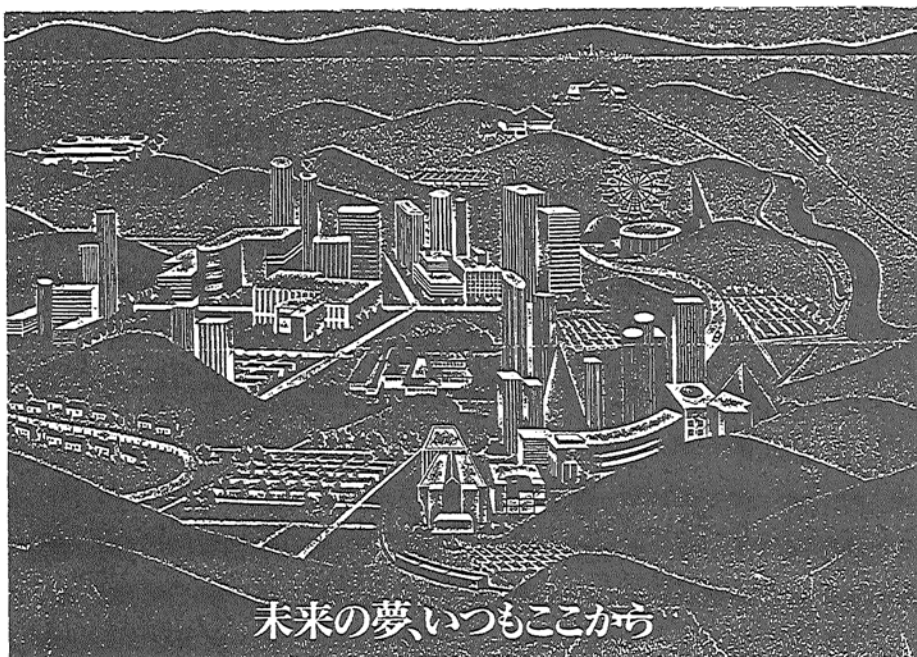
Wolferen 的看法，現代日本仍然不具備作爲自由主義近代國家的兩個必要條件——主權國家和自由市場經濟。其所以如此，應歸咎於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接着而來的批評是來自美國的一系列 Japan Bashing 的評論與論著。外界的批評無疑給日本的知識界當頭棒喝，喚醒他們如一味地陶醉於肯定其特殊性，日本將不見容於國際社會。

今日，日本雖在經濟上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在世界上則到處碰壁，引起其他國家的不信與警惕。考其原因，的確是個文化問題。因爲日本文化的價值觀與理念欠缺了普遍性，無法成爲世界其他民族的共同語言。在歷史上日本曾經也當過霸權國家。戰前曾把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向亞洲各民族，以天皇爲最高家長的所謂「八紘一宇」的價值觀即是。結果一敗塗地，種下無窮的禍根，相反歐美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觀則普遍地成爲全世界的共同語言，這令經濟大國的日本羨慕不已。

日本文化何去何從

在當今國際社會上，日本文化何去何從是日本各界所關心的問題。關閉自守，一味肯定自己文化的特殊性顯然無濟於事，惟有從日本四島發出全人類共同的語言、信息、價值觀，日本文化才能在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求得生存：很多企業家更以行動支持這類事業。譬如，1985年他們相繼設立「日本國際獎」、「京都獎」，去年又設立「高

圖 大阪、京都、奈良一批財界人士正合力推進的一個「關西文化學術研究都市」計劃，開始了二十一世紀人類文化的新的夢想。



松宮殿下紀念世界文化獎」，大要把諾貝爾獎取而代之的氣勢。

企業界的努力不僅僅止於設立這類國際性的文化獎來增長日本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大阪、京都更有一批財界人士正在合力推進一個大型計劃，即在二十一世紀初完成「關西文化學術研究都市」的建設。在開宗明義「都市建設的意義」一文中申述了此一計劃的目標：

今日，我國已發展到承擔世界經濟的重要一環，今後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分子，為了進一步對人類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實有必要加強基礎科學，振興創造性的學術研究，並且在繼承日本固有文化的同時，應力求與世界其他文化交流和融合，以創造出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新文化。

的確，在邁向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的地球時代，日本最迫切的問

題應是其文化的「國際性」或「世界化」。讓吾人拭目以待，看看這個「京、阪、奈」（京都、大阪、奈良）構想是否將會創造出人類文化的新氣息。

王崧興 1935年生於台灣，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畢業，旋赴日本、英國深造，獲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先後任職於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現任日本中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王博士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漢人家族制度、中日社會結構的比較、閩南及台灣社會史。